

「新聞」概念的再思考：本土新聞批評史中 語言學分析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王孝勇**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語言學分析在本土新聞批評史的歷史意義，並藉此再思考「新聞」的概念。有別於過去研究將語言學分析歸類為「現代後期」，本研究首先以對比哲學看現代與後現代，並援引此概念架構檢視本土新聞批評中的語言學分析。本研究發現：本土新聞批評史產生兩種不同取向的語言學分析，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分析展現相當的現代性，而受到後結構主義與功能學派影響的批判取向語言學，則在許多面向展現後現代的文化特徵。從本土新聞批評史的歷史脈絡來看，本研究進一步指出：語言學分析一方面修正實證主義對於真實的思考與預設，另一方面承繼批判理論的關懷，開啓後現代的「新聞」概念。

關鍵詞：批判取向語言學、後現代性、現代性、結構主義語言學、新聞批評史

* 本文寫於「新聞史專題」課程所完成的學期報告。本文初稿曾經宣讀於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舉辦的「2005 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學生。E-mail: hy1227.wang@msa.hinet.net

壹、前言

九〇年代末期，本土新聞批評史密集出現以語言學分析方法檢視新聞的相關研究。語言學分析作為一個新的研究取徑，除了替新聞批評另闢蹊徑，提供我們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反省「新聞」的形式、內容與條件，語言學對於真實(reality)的思考以及語言學正視人類認知、經驗真實的過程中「語言」所扮演的角色…也對「新聞」的定義帶來衝擊。因此，在語言學與新聞批評的關係得到確立之際，有必要針對語言學分析下的「新聞」概念以及語言學分析在本土新聞批評史中的意義加以研究。⁽¹⁾

林元輝(2004)在〈本土學術史的「新聞」概念流變〉一文中，曾經試圖勾勒出本土新聞批評的歷史圖像，並在此脈絡下思索語言學分析透露出的「新聞」概念及其歷史意義。在建構本土新聞批評史的歷史圖像方面，林元輝指出，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的「前現代」時期，「新聞」是反映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神諭」。1950年以降的「現代前期」，「新聞」是實證主義的產物，被認為可以如同鏡子一般傳遞正確無誤的事實給大眾。然而，隨著七〇、八〇年代許多新聞正確性的研究發現「新聞」當中存在著許多主觀性錯誤，「新聞」似乎是「哈哈鏡」的說法開始受到重視，甚至間接影響了九〇年代中期的「現代中期」，論者以批判理論檢視媒介訊息中，權力與意識形態運作的軌跡；以及九〇年代中期以後的「現代後期」，採用框架理論探索新聞工作者或新聞組織基於何種認知基模與意圖，會主動篩選新聞，傳遞「感覺上為真」的媒介真實。語言學分析也約莫於此時介入本土新聞批評史，一系列關於「新聞語言」的研究揭示出「新聞」的目的並不在告知，而在說服。而語言學分析對於「新聞」概念的重新意義化，也使得之後的「後現代時期」所形容的諸如拼貼、擬仿等美學風格，讓我們在思考「新聞為何？」時，逐漸有其解釋力。

若我們進一步檢視林元輝(2004)所建構的本土新聞批評史，特別是其中對於語言學分析的說法與歸類，可以發現一些值得謹慎地再評估之處。林元輝指出若從「與(客觀)真實的關係」這點出發，則語言學分析下的「新聞」其實是「說客的面具」，傳遞主觀的真實；而語言學分析的認識論屬於「詮釋典範」，可以劃歸為「現代後期」。林元輝所謂的「現代後期」，是認為語言學分析仍相信外在真實的存在，但是透過語言的中介，人們看到的新聞是帶著「實證語言」的面具，把所呈現的弄得像真的一樣，以遊說讀者相信的「擬真」產物。甚至，這個遊說過程充滿了權力交鋒的軌跡，新聞是替特定階級代言的意識形態。而「現代後期」的語言學分析指出「鏡子論」的虛妄，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對實證主義、新實證主義認識論的修正。

本文認為林元輝(2004)的分析對於本土新聞批評的歷史重建有相當精闢的見解，同時也對語言學分析下的「新聞」概念作了非常細緻的討論。但是若從「現代性」(modernity)的角度來思考(這是林文主要的理論解釋架構)，則語言學的歷史定位恐怕不見得可以被清楚歸類為「現代性」，而是同時具有現代與後現代的特質。主要是因為語言學分析介入本土新聞批評，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取徑，分別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和受到後結構主義與功能學派影響的「批判取向語言學」。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分析與現代性較為接近，而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則在許多方面展現出後現代性。⁽²⁾這樣的觀察印象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所以，本文將從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角度重新檢視語言學分析下的「新聞」概念，並探討本土新聞批評史中語言學分析的歷史意義。

作為一篇論史的研究，本文有以下兩個基本立場：首先，為了深入反思「新聞」的概念，本文將從兩個層次著手。第一個層次是對相關研究中透露出的「新聞」概念加以討論，主要在探討語言學對於「新聞」的思考；第二個層次是從後設的角度，進一步釐清相關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論立場。本文認為這兩個層次的討論有助於從現代與後現代的架構定位語言學分析的歷史位置。正如劉慧雯(2001)指陳，從「現代性」的架

構建構新聞批評史，其價值一方面有助於我們瞭解傳播學門大量借用「現代性」概念所衍伸出的學術思潮走向，另一方面，對於「現代性」的反省也提供了建構每篇文章所採取的理論與方法論立場的機會。所以，本文主張從以上兩個層次探討「新聞」，除了可以幫助我們檢視相關研究對於「新聞」的思考，此外，藉由摸索相關研究的後設立場，或許更能精確地定位語言學分析在新聞批評史中的歷史位置。⁽³⁾

其次，有別於編年體的、歷時性的歷史建構編纂方式，本文將以語言學分析介入新聞批評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為軸心，深入討論此一時期的「新聞」概念。一般新聞史或傳播史的研究多半採取歷時性的書寫策略，爬梳特定議題在數十年歷史洪流中的演變（何東洪、張釗維，2000；林麗雲，2000a、2000b、2002；程宗明，1999、2000）。歷時性的歷史建構策略雖然可以掌握長時期的歷史脈絡，但是往往對於歷史脈絡中特定時期的詮釋不夠深入。本文以九〇年代末期語言學分析介入本土新聞批評這個特定時期為分析對象，建構歷史的方式將先從共時性的角度探討語言學分析的內涵以及語言學分析下的「新聞」概念，再將語言學分析放在本土新聞批評的歷史脈絡下加以定位。

在前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立場上，本文首先對比哲學討論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內涵，並且將其轉化為可供分析與詮釋的架構。接著，從檢視語言學分析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看「新聞」的概念為何。最後，思索語言學分析在本土新聞批評史上的意義。

貳、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本文所說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是現代、後現代所顯示的文化特徵。在談論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前，先對現代與後現代作一討論。

目前學界對於現代與後現代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些學者傾向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指出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資本週轉時間

(turnover time)的加速使得僵化的福特主義得到修正，也掀起了新一波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新科技縮減生產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並且有效地消滅空間上的限制。據此，產生了後現代式的紛亂、破碎、騷動的美學風格(Harvey, 1989, 1990)。也有學者從人類智識發展歷程來看現代與後現代，認為後現代是對啓蒙時代以來的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的反動（王晴佳、古偉瀛，2000；Fishman, 1999）。還有學者從歷史書寫著手，直指現代主義對於歷史再現客觀真實此一論點的謬誤。後現代歷史學者主張歷史書寫無法真正重建過去，充其量只是歷史編纂者以現在的眼光賦予過去實際發生過事情的某些意義。就這點來說，歷史的本質是語言的虛構物，也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其內容為杜撰的與發現到的參半（Jenkins, 1991 / 賈士衡譯，1996；Jenkins, 1995 / 江正寬譯，2000）。

這些說法雖然各自有側重的焦點或所屬的學科範疇，不過大多同意現代與後現代是相對性的、關係性的概念。所以，要同時瞭解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亦即現代與後現代在文化上的特質），比較恰當的方式是採取對比哲學(contrast philosophy)的立場，從後現代對現代的批判與超越為思考起點，並進一步討論現代與後現代的文化意義（高宣揚，1999；Fishman, 1999; Jameson, 1991）。⁽⁴⁾

一、理論基礎：從對比哲學看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對比哲學」是一種哲學構想與態度，目的在藉由摸索或建構不同哲學思潮彼此間對話、對照與對立的空間，以擴充知識的範疇與理論意義（沈清松，2000；蔡瑞霖，1997）。所以，從特定的抽象思維重讀(re-read)、甚至批判其他哲學體系的認識論，本質上可說是對比哲學的實踐，後現代對於現代性知識宣稱的挑戰即是最佳的個案。而藉由對比哲學，我們將可以釐清特定思潮在哲學史、觀念史上的位置，避免以去歷史化(without history)的方式對其加以理解。

華人學者中，標榜對比哲學最力的為沈清松教授。他曾經為文從對

比哲學探討現代與後現代，並且歸納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具體內涵。沈清松(1993: 4-5)指出「後現代並不是現代的結束，它事實上是現代的延續，甚至是其加深；然而在此延續歷程裡也包含某種斷裂」。他還主張「(後現代)對於現代的本質、現代之所以為現代的『現代性』，要提出批判、質疑和否定」。沈清松因此藉由後現代對現代的批判、質疑和否定摸索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一) 後現代對「主體哲學」的批判

啓蒙時期是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也是現代性知識形構的情境條件。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肯定了人作為主體的主體哲學(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以人為中心的主體哲學也成為了現代性的核心意涵。主體哲學實踐在人類智識發展上，成就科學與實證主義的興起。因為主體哲學認為人類作為認知與思想的主體是無庸置疑且不須證明的，所以生活世界的種種現象均可被主體給客體化(objectify)，並透過科學的方法有效地加以研究。

後現代則認為現代主義視人類為具有主體性的行動者簡化了「主體」的多重樣貌，因為人類可能同時是自由的主體，也是被研究或被決定的客體(Foucault, 1994; Ritzer & Goodman, 2001)。⁽⁵⁾另外，後現代也指陳如果主體本身成為一種絕對，那麼它就無法再接受其他的主體，「當道的言說」於是成為「封閉的論述」(a discourse of closure)，⁽⁶⁾是權力極大化的產物。後現代的批判於是開始追問「這個主體裡面的什麼能力或先驗的形式使它成為可能？」(沈清松，1993: 18)所以，不同於現代追問主體的結構與意義，後現代主要在試圖揭露主體於建構過程中的權力和制度。

(二) 後現代對於「再現真實」的質疑

主體哲學影響了人如何看待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係。現代主義下，人作為一個思想與認知的主體是不可懷疑的真理，自然世界因此被人看

作是自身之外的客體，人可以透過與外在世界疏離的方式來研究它、再現(represent)它、甚至控制它。當現代主義認為外在世界可被客體化而供人類研究，基本上預設外在真實或客觀真實的存在以及可被再現。

此外，理論與概念的產生也是現代性的特色。現代主義指陳人類再現外在世界的過程中，會「透過濃縮的方式表演世界正在進行的狀況」（沈清松，1993：11）。所以，理論與概念本質上是現代性的具體實踐。自然科學、實證論的社會科學所發展出的理論與概念，宣稱可以透過嚴謹的科學方法與步驟，忠實地再現外在真實並找到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universalism)，即是現代性認識論的極端版本。

這個極端版本在近來也做出了一些調整。新實證主義對於再現真實的說法不再如此絕對，但是新實證主義仍然認為人類可以透過研究而趨近真實，⁽⁷⁾ 因此仍然可以歸類在現代性的架構中。

相對於現代性相信真實的確存在且可被再現(儘管新實證主義對於真實是否可被百分之百地再現持較為保守的態度)，後現代則提供了一套對再現的批判(a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以及對理論反應實體外在真實這種現代信仰的批判(Best & Kellner, 1991 / 朱元鴻、馬彥彬、方孝鼎、張崇熙、李世明譯，1994)。沈清松(1993)借用語言學的術語「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來對比現代與後現代對於真實的不同看法。他指出現代所說的「表現」或「再現」總有一個「所指」，但後現代認為「所指」已經消失，真實已經幻滅，「表象」或「再現」在後現代裡轉變成為一個個不再與外在真實對應的擬仿物(simulacra)。後現代的文化因此產製出超真實(hyper-real)的擬象—既非真實，卻又比真實更為真實(Baudrillard, 1981 / 洪凌譯，1998)。所以，後現代的真實是「建構的真實」。不同於現代性的「再現真實」看重符號的使用價值(use value)與所指，後現代的「建構的真實」更關注的是符號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與能指(Baudrillard, 2000)。

(三) 後現代對「大敘事」或「後設敘事」的否定

從笛卡兒以降，關於現代性的理論論述都擁護理性(reason)，將理性視為知識與社會進步的根源、真理之所在以及系統性知識的基礎。理性被視為足以發現適當的理論規範與實踐規範，憑藉著這些規範便能夠建立思想與行動系統，社會也能夠再造(Toulmin, 1990)。現代性的理性化歷程提供了一套後設的大理論來支撐知識的正當性基礎。因此，舉凡科學、藝術...都有一套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或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來證陳自己(沈清松，1993)。例如 Habermas(1971)指出人類知識的目的/旨趣(interest)是爲了透過批判的理性(critical reasoning)與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而達到「解放」(emancipation)；又比方說源自於啓蒙傳統的實證主義，其後設敘事是「追求客觀知識」，客觀性(objectivity)成爲探索知識的最高指導原則。

後現代則認爲無法用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單一道理來解釋、說明並統一切，各種理論都是在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中互相競爭的論述(Lyotard, 1984)。所以，後現代唯一的「大敘事」就是「大敘事已死」的大敘事(a grand narrative of the decline of the grand narrative)(Lyotard, 1993: 29)。⁽⁸⁾ 沈清松(1993)進一步指陳「大敘事已死」最爲深刻的實踐便是否定理性原有的二元對立邏輯。所謂的「非真即假」失去了意義，「即真且假」才是後現代性的表現。

二、分析架構及其適當性

以上從後現代對現代的批判與超越討論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建立本文的理論基礎。接著，將試圖把理論轉化爲可供分析的架構，並且說明此一架構的適當性。

在關於真實的思考與預設上，現代性的特色在於相信真實可被再現，而後現代性的真實是建構而來的，後現代甚至否定外在/客觀真實的存在，認爲真實並無可以指涉的實體，真實是符號的擬象。在新聞批

評的領域中，外在真實是否存在以及新聞是否可以忠實再現真實一直是核心的命題。Adoni 與 Mane(1984: 327)指出真實可以區分為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與符號真實(symbolic reality)三種，而媒介研究基本上在探討媒介文本的符號真實與客觀真實、主觀真實彼此間的互動或對應關係。Adoni 與 Mane 並且指出大眾媒體的內容是符號真實，新聞從業人員扮演著把客觀真實轉換成爲符號真實，進而影響閱聽眾形塑主觀真實的角色。

Adoni 與 Mane 提出的「真實」分類架構造成相當大的回響，後來學者儘管對於新聞與真實的關係有相當分歧的看法，但基本上都可以視爲和 Adoni 與 Mane 進行對話（例如：翁秀琪，1994；戴育賢，1994；McQuail, 2000; Tuchman, 1978）。這裡，本文將試圖從認識論角度，分析結構主義學派與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如何定位新聞的媒介真實，並且思考不同取徑的語言學認識論所展現出的現代性與（或）後現代性。

現代性下的主體哲學是本文另一個分析的切點。主體哲學認爲人類具有完全的主體性，可以再現世界，進而控制世界。但是這樣的論點被後現代批評爲太過簡化、單一。後現代看到的人類主體可以是被權力打造的主體，也可能是被權力所客體化的主體或規訓的客體。現代與後現代對於主體的不同見解，也使得它們在具體實踐上有所差異：現代追問主體的結構與意義，後現代主要在試圖揭露主體於建構過程中的權力和制度。這裡本文將討論不同取徑的語言學分析在研究目的上所側重的焦點，並藉此思索其現代與（或）後現代位置

不同取徑的語言學分析對於真實與主體所抱持的觀點其實來自於背後的理論或方法論立場，以助於瞭解其現代性或後現代性。這裡主要在摸索支撐語言學分析的後設哲學，可能的討論焦點在於：是否有一套大敘事自我證成其知識的正當性基礎？

關於本文研究架構的適當性，大致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談：首先，在理論與個案的貼近性上，由於「新聞」是現代觀念下的產物（林元輝，2004：57），所以以現代性爲分析架構似乎較可貼近新聞的核心內涵。

另外，相關研究也發現「現代性」在本土新聞批評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跡，可供後續相關研究繼續探索（劉慧雯，2001），因此現代性的架構在建構新聞批評史上有其適當性。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新聞」的概念也產生了一些變化，逐漸反映出後現代的特色（林元輝，2004；蔡珮，2003）。所以，本文從對比哲學看待現代與後現代，並嘗試歸納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具體特徵，有助於掌握個案的特殊性。

再者，在研究策略上，本文試圖藉由兩個層次的分析，深入詮釋語言學分析的內涵。從對比哲學看現代與後現代提供的架構，除了可以藉由檢視相關研究看待「真實」與「主體」探索「新聞」的概念，還可以進一步思考不同學派的語言學分析背後的理論與方法論立場，符合研究上的需求。

最後，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一方面使我們得以對語言學進行共時性分析，另一方面也足以讓我們審視本土新聞批評史的歷史流變，掌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在本土新聞批評史中的消長，並思考語言學分析在其中的意義，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參、文本選擇與分析步驟

本文主要的研究材料來自國內傳播學界主要的兩本期刊《新聞學研究》、《中華傳播學刊》以及歷年國科會研究報告。《新聞學研究》是由政治大學新聞系編輯的刊物，創刊於1967年5月20日。至今（2004年12月）歷經三十八年，共出版了八十一期。《新聞學研究》是國科會人文社會期刊中最早入選TSSCI的傳播專業期刊。《中華傳播學刊》是由國內最大的傳播學術社群「中華傳播學會」所編輯的刊物，創刊於2002年6月，至今（2004年12月）共發行了六期。國科會研究計畫提案則是國內傳播學者從事基礎研究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有助於瞭解學門發展的生態（陳百齡，2001）。文本選擇的時間跨度自1967年5月《新

聞學研究》創刊到 2004 年 12 月本文開始撰寫為止。

文本選擇的判準有二：(一)以「新聞」為研究主體或間接探索「新聞」概念的研究論文；(二)以語言學取徑為研究策略的研究論文。同時符合這兩項判準的論文才被本文納入分析的範疇。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在蒐集文本時，對於「新聞」乃是採取較為寬鬆的界定，原因如下：首先，舉凡新聞教科書、新聞工作者、媒介組織、新聞報導透露出的對「新聞」的想像雖然或有不同的切入點與側重面，但基本上都環繞「新聞為何？」此一根本命題；再者，追問「新聞」的實質內涵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並非研究假設或前提，所以在此階段並不傾向對「新聞」下嚴格的操作型定義。

經由上述兩項判準篩選之後，本文共選取了 16 篇研究論文作為分析文本，其中，5 篇為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分析，11 篇為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

本文具體的分析步驟將先探討不同取徑的語言學分析透露出的現代性與（或）後現代性，再從本土新聞批評史的脈絡思索語言學分析的歷史意義。

肆、新聞是擬真：語言學分析的現代性

傳統新聞專業義理認為新聞如同「鏡子」，可以忠實地反映真實。而新聞工作者在將事件轉化成為新聞的過程中，被要求不帶情感地涉入，以求客觀中立地呈現事件的原始樣貌。新聞專業義理在本土新聞批評史的發展過程中，與現代性所信奉的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經驗主義息息相關，論者主張透過科學的方法，新聞可以發現且再現客觀的真實。

然而，隨著一連串的研究發現新聞與真實的關係並非如此相對應，「鏡子說」也漸漸受到挑戰。特別是當結構主義語言學被引進本土新聞批評中，過去「新聞等同於真實」的信念受到了全面地挑戰，結構主義

語言學並且以「新聞語言」為分析的起點，進一步建構它們的新聞想像。相關的研究有：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探討新聞工作者在面對不同「事實光譜」的事件時，如何透過語言機制區分事實和非事實，新聞的面貌因此有所不同。鍾蔚文、翁秀琪、紀慧君、簡妙如(1999)探討新聞事實的語言邏輯，並據此推論新聞的本質是擬真，未必反映外在真實。臧國仁、鍾蔚文(1999)以「時間概念」為切點，探討不同事件如何透過時間性語彙再現真實。胡紹嘉(1999)以醫療報導為例，透過關鍵字詞、隱喻和引語使用的分析檢視醫療報導語言中人與身體的圖像和意義。紀慧君(2000)分析新聞教科書的「事實語言」，試圖藉由分析新聞教科書如何界定事實，探知社會對新聞工作者與新聞行業的期待，也對新聞的本質有所瞭解。這些研究分別在對真實的思考與預設、主體哲學以及後設哲學上，透露出不同面向的現代性。

一、新聞：再現的真實

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分析主要受 Saussure(1972/2002)揭示的符號學立場的影響。Saussure 對於語言與真實關係的思考也對結構主義語言學分析有所啟蒙。

Saussure 認為語言和真實的關係並非自然天成，而是「系統」或結構的產物（鍾蔚文，2004：203），所以語言與外在真實並不存有本質上對應的關係。Saussure 並且以語言符號為主體，主張語言符號(sign)是社會體制的實踐，語言符號的意義產製建立在能指與所指任意武斷性(arbitrary)。所謂的任意武斷性，並不意味著人可以憑著自己的愛好任意更動能指與所指的關係，而是直指語言符號是社群成員約定成俗的結果。

Saussure 在標示出反本質論的符號學立場後，他進一步申論能指與所指的概念，建立他的符號學理論。Saussure 指陳語言符號所產製的意義不是結合事物和名稱，而是建立在能指與所指的聯結關係上。能指代表聲音形象(sound image)，所指代表著聲音形象所指涉的概念

(concept)。嚴格來說，在反本質論的立場下，所指牽涉到的比較像是事物在心中的形象。但是，Saussure 仍相信事物存在的基本事實，相信語言可以再現真實世界，也認為能指與所指、聲音形象與外在世界之間有穩定的、單一的對應關係 (Best & Kellner, 1991 / 朱元鴻等譯, 1994 : 40)。所以，或許可以這樣理解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語言學：⁽⁹⁾語言是進入客觀世界的工具，語言的存在也是表現主觀的管道，這是因為外在世界已然存在，當人類透過語言去認知與經驗世界時，必然牽涉到人為主觀成分。而語言的使用以及透過語言符號所產製的意義本身即是社會共識與約定成俗的。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在媒體研究上被運用來理解閱聽眾、文本與社會互動下的意義產製 (劉慧雯, 2002)。此類研究中，媒介文本被視為是由符號所組成的一套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而這套表意系統除了能指透露出的意涵，所指則更廣泛地與文化聯想或社會知識接軌 (倪炎元, 2001)。以本文所關注的新聞批評為例，相關研究對於語言符號的詮釋基本上都是從能指開始，先探討新聞語言所產製的意義，接著再將文本意義推論到巨觀層面，試圖指出新聞文本中的語言符號如何扭曲真實，以及新聞再現的真實媒介真實和客觀真實間的差距。

翁秀琪等人(1999)指出新聞報導所要求的「事實」，乃是絕對主義概念下的真實，有發生或確定會發生的事情才被允許報導，記者的主觀判斷必須抽離。但是，「事實語言」與「事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新聞事實必須透過事實語言的機制才能展現在閱聽眾的面前。而事實語言可能代表事實，也可能扭曲事實。從這個研究發現來看，翁秀琪等人其實預設了客觀真實的存在，並以此為構成「新聞」的底限，只不過透過新聞的事實語言所再現的媒介真實不必然等於客觀真實。翁秀琪等人並且舉出不同事實光譜的事件為例，探討新聞寫作如何透過字詞的使用、文法結構與修辭再現客觀真實，特別是在靈異新聞此類超經驗事實中，記者經常依照自己對於特定事件的判斷與相信程度，以「投射」(projective)句型引述他人的真實經歷 (例如：白冰冰撞見清水祖師爺)，

以強化新聞的可信度。翁秀琪等人並且將新聞語言分類為新聞行規的事實語言和日常生活的事實語言兩種，認為靈異新聞的事實性相當程度植基於在地文化中對於陰陽兩界溝通的常識。

綜觀翁秀琪等人的研究，其實透露出以下幾點對真實的預設：（一）新聞再現的真實必須有其事實基礎；（二）透過語言所再現的真實有可能與事實有所出入，但也有可能一致；（三）如果新聞再現的真實與客觀真實不一致，那是由於記者主觀判斷及其語言使用所致。

相較於翁秀琪等人的研究相信有一套和客觀真實對應的語言機制，鍾蔚文等人(1999：582)則指出事實無法直接觀察與感知，語言也無從成為反映真實的明鏡，所以關注的問題不再是語言如何呈現事實，而變成：新聞透過什麼樣的事實邏輯遊說讀者相信其真實性。鍾蔚文等人並且指陳，新聞的許多語言機制主要的功能不在反映真實，而在模擬真實。但是鍾蔚文等人並無意願並替建構論背書，而是認為事實的界定要向人間去求取，事實的樣貌與邏輯來自於文化的共識。所以，新聞事實反映出社會對事實的共識。

若以 Adoni 與 Mane(1984)對真實的分類架構來談，鍾蔚文等人對於真實的思考明顯以媒介真實為主軸，認為媒介真實建立在客觀真實中，因此雖然新聞透過語言所再現的真實不一定等同於客觀真實，但是藉由摸索新聞邏輯，我們仍然可以趨近客觀真實。就這點來看，鍾蔚文等人雖然認為新聞語言不一定可以忠實反映客觀真實，但至少是探索客觀真實的線索與基礎。

另外，從鍾蔚文等人以「擬真性」來界定新聞語言的本質，也不難發現結構主義語言學分析對於真實的思考雖然與科學主義認為真實可以完全被再現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是結構主義語言學仍然預設了一個就在那裡(out there)等著被發現的客觀真實（既是模擬真實，必定以真實的存在為前提）。客觀真實的存在使始得研究者必須藉由探索新聞語言的邏輯，揭去遮蔽客觀真實的面紗。

二、揭露「語言系統」的結構與意義

啓蒙運動信奉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說法，認為人是充分自覺和自主的主體。但是，Saussure 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則指出語言的獨立性與結構性，並且主張語言並非由人所駕馭，可以說和現代性的主體哲學產生了部份分歧。

Saussure(1972/2002)將語言分成語言系統(langue)與言語行動(parole)，語言系統是語言的深層結構，言語行動是實際的話語。Saussure 並且認為語言系統統一所有言語行動的結構與秩序，因此人類透過言語行動傳達意義，必須建立在語言系統上。從這點來說，Saussure 認為人類思想的過程受制於語言系統，因此在實際的分析上，要以語言系統為分析對象。此外，Saussure 指出語言系統具有不可變動性與一致性，一旦一種語言被廣泛接受與使用，即使是專家、文法家、邏輯家也很難對其做出改變。因此，Saussure 所謂語言系統的主體是虛懸的，甚至是不在場的（倪炎元，2001：137）。在 Saussure 的語言世界裡，人不再是系統的主宰，改變了啓蒙以來人爲中心的形象（鍾蔚文，2004：209）。

(10)

雖然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於人類主體的立場與現代性的主體哲學有所分歧，但是 Saussure 對於語言結構的重視以及語言結構限定言語行動的說法，使得他特別在意尋找結構的規則與意義。這點與現代主義希望追尋放諸四海皆準的準則卻是十分雷同。前述翁秀琪等人(1999)探討新聞如何再現超經驗事件以及鍾蔚文等人(1999)分析新聞事實的邏輯，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夠藉由釐清新聞報導在再現真實中的過程（言語行動），探索新聞事實的語言結構，可以說是具體實踐了 Saussure 的主張。

臧國仁與鍾蔚文(1999：159)也有類似的研究目的。他們指出新聞報導與時間概念息息相關，無論在選材價值的判斷或是組織內部的常規運作，新聞工作均不斷受到時間概念的規範與約束。兩位作者因此以新

聞報導中的時間語彙為思考起點，藉由比較純淨新聞和事件導向的新聞報導中，時間性語彙分布的狀況與出現頻率，探索新聞的時間語言如何再現真實。研究發現：時間一方面用來作為符號工作者再現真實的工具，另一方面卻又是新聞中被呈現的對象。主觀的時間概念認為時間是可操作與可逆轉的，這種時間概念大量出現在純淨新聞的寫作格式中，符合倒寶塔式的新聞寫作風格；而客觀觀點的時間概念認為時間是持續前進、無從回頭的，則較常出現在事件導向的新聞報導中。所以，新聞文本可以說是由時間詞句堆積而成的一種真實再現活動。

紀慧君(2000)則以新聞教科書為例，藉由分析新聞教科書中的「事實語言」思考學門內部對於新聞本質的想像與新聞事實的界定。她指出，將記者定位在「傳話者」的角色、讓消息來源說話、舉出實例或數字為證據...是新聞教科書中對於新聞工作者以及新聞報導的期待，這樣的期待迫使新聞報導必須排除記者個人的意見、價值與偏見，以達到所謂的「真實」。紀慧君並且指出，理解新聞的事實語言同時意味著對於新聞之所以必須「真實」、新聞事實的知識觀，以及學術社群中對新聞的想像有所洞察。

上面四篇研究比較多的心力放在摸索新聞語言的結構。胡紹嘉(1999)則關心新聞透過語言機制所傳遞出的意義。他以醫療報導為例，借用語言學的關鍵字詞、隱喻和引語使用的概念為分析架構，解讀醫療新聞報導如何透露出主流的醫學觀，而這樣的醫學觀又是如何看待人、身體與疾病的關係。在關鍵字分析上，胡紹嘉探討複製羊新聞中的「複製」一詞以及冰晶療法新聞中的「另類療法」一詞的語言系譜；在隱喻分析上，則以腸病毒事件為例，探討相關新聞中大量出現的「戰爭」、「敵人」的隱喻，並指出這樣的隱喻使用使得腸病毒的疫情與防治被形容成一場「人與腸病毒的戰爭」；在引語分析上，則以愛滋病報導為例，討論相關新聞的直接引語、間接引語、自由間接引語的分布及其意義。胡紹嘉的分析主要在揭露醫療新聞文本的內容、意義與價值觀，符合現代性追問意義的特質。

三、客觀主義作為大敘事

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結構主義的語言學修正了實證主義的「新聞」概念，認為新聞未必等同於客觀真實，充其量只是透過語言機制模擬客觀真實。但是結構主義語言學仍然相信且預設客觀真實的存在，並主張只要透過釐清新聞語言邏輯以及理解新聞的語言系統，即可以盡可能地趨近真實。在這樣的動機上，翁秀琪等人(1999)、胡紹嘉(1999)皆具體指陳研究新聞語言的價值在區辨新聞再現真實的規則，以培養研究者與讀者批判的語言自覺(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鍾蔚文等人(1999)、臧國仁與鍾蔚文(1999)、紀慧君(2000)也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對新聞的事實本質提出規範性的思考。

新聞事實的語言邏輯之所以需要探索，是因為論者意識到透過語言所再現的媒介真實與客觀真實之間不一定完全等同，而為了使得媒介真實能夠忠實地再現客觀真實，傳遞正確、不帶偏見的訊息給閱聽眾，因此我們需要培養批判的語言自覺，對新聞語言抱持著更為敏銳的觀察力與洞察力，並進一步追問新聞的事實本質。由此看來，新聞專業義理對於客觀性的標榜，成為結構主義語言學分析的後設敘事，用來證陳其知識的正當性基礎。客觀主義同時也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分析中不可被挑戰的大敘事，統攝一切的知識產製規則。這其實展現出十分明顯的現代性格。

伍、新聞是論述：語言學分析的後現代性

有別於結構主義語言學分析追問新聞事實如何可能，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則將新聞文本視為論述競逐的場域，不同立場與發聲位置的論述都必須在新聞文本中競逐優勢的地位，以傳遞特定的意識形態。

事實上，對於新聞是論述的討論早在九〇年代中期就已經出現。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馮建三(1995)、林芳玫(1995)的論文。馮建三的〈科

技新聞是意識形態嗎？探討科技記者與科技專家的關係兼論另類科技新聞的可能空間》一文借用批判政治經濟學對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分析科技新聞產製過程中記者與科技專家（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文中指出：科技新聞在記者缺乏相關科技背景知識的情況下，科技專家握有了論述的主導權，科技新聞因此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林芳玫的〈師大強暴「疑」案報紙報導之分析：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則以女性主義對父權的批判為立論基礎，分析1994年師大強暴疑案中，主流媒體的強暴論述。研究發現：媒體報導默許男性行為自由度的擴張，同時將抗拒男性的行為責任加諸於女性身上，明顯鞏固了性別主義。這兩篇文章雖然或多或少借用到語言學的概念對新聞進行文本分析，但基本上皆以批判理論為研究的立場，語言學則為輔助的研究工具。

九〇年代末期，本土新聞批評出現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可以說繼承批判理論對於文本意識形態的關注，但不同之處在於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轉而以語言為研究主軸，拆解新聞文本中的意識形態軌跡。相關研究有：翁秀琪(1998)以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文本為例，對其進行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分析，並建構能夠適當詮釋華人文化中的人情世故之「在地權力觀」，可以說是最早系統性地引介批判語言學進行新聞文本分析的論文。隨後，翁秀琪與陳慧敏(2000)借用批判語言學提供的文本分析策略分析美麗島事件的新聞報導，試圖探索大眾媒體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在批判語言學對於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思考基礎上，翁秀琪(2001)還援引集體記憶與認同的理論，探索主流媒體如何藉由語言文字的使用，建構一般大眾對於美麗島事件的集體記憶、並塑造國家與族群的認同。翁秀琪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在本地新聞批評中的理論基礎，也對後來相關研究有不同程度與面向的啟發。

除了翁秀琪，倪炎元是批判取向語言學陣營的另一位大將。倪炎元於1996年發表的論文〈主流與非主流：報紙對一九九〇年國民黨黨內政爭報導與評論的論述分析〉是本地最早出現具批判意識且以探討語言

問題為主的研究論文。文中首先比較政治立場對立的兩家報紙（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對於 1990 年 2 月發生的國民黨政爭的報導與評論，接著探討媒體如何替特定的政治論述代言。倪炎元後來分別針對媒體再現的他者（倪炎元，1999）以及媒體再現的女性菁英（倪炎元，2002）進行批判言說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方面揭露媒介文本如何建構真實，另一方面思考媒介真實背後的權力關係。

翁秀琪與倪炎元以降，批判取向的語言學被廣泛應用新聞批評。其中，某些研究延續了批判取向語言學對於媒介真實中意識形態問題的核心關懷（例如：蔡篤堅，2000；戴育賢，2002），也有研究者延伸批判取向語言學對於「權力」的討論，探討論述如何在媒介場域中取得發言權與正當性，進一步挑戰了傳統對於「新聞」的概念（例如：紀慧君，2002a、2002b、2003）。

一、新聞：建構的真實

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在認識論上受到了後結構主義與功能學派的影響。後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立場不像結構主義者把語言運作的範圍侷限在能指與所指此任意武斷且不可變異的聯結關係，而是主張能指凌駕所指之上，以便彰顯語言的動態生產性與意義的不確定性(Derrida, 1973, 1967/1997)。

所謂語言的動態生產性與意義的不確定性，是把能指看作是無休止的指意(signification)過程中的一部分或一種可能。在這個指意過程中，「意義」產生於無限的、文本之間的能指運作，能指本身成爲一種符號性的、象徵性的東西，能指所產製的符號其價值在交換，而不在具體指涉真實世界的某些面向。Best & Kellner (1991 / 朱元鴻等譯，1994：41, 46) 有以下的說法：後結構主義徹底拋棄了陳舊的意義再現結構(representational schemes of meaning)，後現代則進一步援用後結構對真實的批判並加以基進化，建構後現代的理論基礎。⁽¹¹⁾

而這裡的功能學派，指的是以 Halliday(1978, 1994)爲首的系統功能

學派的語言學(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此派學者批評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太過於急切想要找尋普遍性的、放諸四海皆準的語言結構，因此把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想的太過單純。Halliday 認為能指與所指的連結是有動機的(motivated)，是有特定目的與功能的，這個特定的目的與功能反映出人類因應環境的基本需求與應對，因此語言是拿來做事的，不是拿來再現真實。據此，功能學派語言學在實踐上，著重語言分析的重點正是特定情境脈落下的溝通行動（倪炎元，2001：137）。

無論是後結構主義或是功能學派，都對現代性的「再現真實」提出批判。對於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來說，客觀真實的存在與否根本不是要討論的問題，批判取向的語言學認為媒介真實就是一個指意系統，這個指意系統建構了真實，形塑了閱聽眾腦海中的主觀真實。

在本土新聞批評中，翁秀琪(1998)的〈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一文，指出語言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記者可以透過使用及物動詞(transitivity)、語態(modality)、動詞變名詞(nominalization)、主動變被動(passivization)...等語言機制建構新聞事實，即明顯指出語言在建構真實上的說服力量。除了建構新聞事實，語言還可以構塑一般大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使得人們對過去事件的認知符合主流政治體制的利益（翁秀琪、陳慧敏，2000），進而形成集體記憶（翁秀琪，2001）。倪炎元(1996)的研究也發現代表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社記者可以使用不同的敘事結構、文字語意與修辭建構不同的媒介真實，影響閱聽眾對於事件的認知。此外，媒介也可以藉由對特定議題的報導或強調，建構女性政治菁英的媒介真實（倪炎元，2002）。

這些研究一方面不約而同地指出媒體在建構真實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另外，從他（她）們專注於分析媒介真實與主觀真實的關係來看，似乎也暗示所謂的「真實」已經失去具體指涉的客觀實體，新聞同時成為沒有所指的能指，建構比客觀真實更為真實的超真實。

換個角度來說，新聞之所以成為超真實，是因為新聞建構的真實世

界是閱聽眾經驗世界的主要憑藉，這裡，閱聽眾出現在「新聞」的概念中。閱聽眾的主觀認知也參與了建構真實的過程，只不過此處所說的閱聽眾並沒有被賦予主動的意涵。

「新聞」的概念除了納入閱聽眾之外，還可以更為廣義。倪炎元(2002)的〈台灣女性政治精英的媒體再現〉一文，指出女性政治菁英相對於一般女性而言，擁有較多的發聲空間。所以她們不僅僅是被塑造或被建構的客體，她們同時也是提供論述的主體之一。這個研究發現，除了使(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正式關注到新聞產製過程中涉及多重發聲主體的問題，也讓傳統「新聞」的概念以及傳統的新聞批評把焦點侷限在新聞產製者的面向(例如：以語言學分析來說，相關主題就是記者新聞語言的使用及其意義)之情況開始鬆動。紀慧君(2002b、2003)的幾篇研究都涉及重新建構「新聞」的概念。

紀慧君(2002b)的國科會結案報告《是真與擬真之間：新聞語言的互文性網絡》發問：新聞成為真實的基礎是什麼？她認為新聞事實的建構過程是相關事件的各方協力、衝突與協商的對話過程。記者、消息來源、當事人其實分別在提出他(她)們的「事實宣稱」，建構新聞事實。紀慧君(2003)的〈定位的政治：主體與權力研究的再思考〉，以璩美鳳光碟案為例，進一步申論前述提出的觀點。這篇文章中，紀慧君分析璩美鳳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藉由定位他人定位自己、他人如何定位璩美鳳，以及璩美鳳與散佈性愛光碟的獨家報導如何定位閱聽眾...，證實了不同的立場與發聲位置同時參與建構新聞事實的可能。紀慧君還細緻地描繪出不同立場與發聲位置的人所建構出的新聞事實版本。紀慧君的研究定位「新聞」為多方論述角逐的成品，新聞是論述。

Ritzer & Goodman(2001: 155)指出後現代認識論對於語言與真實的立場是質疑語言與外在真實/客觀真實的對應關係。後現代主張語言本身即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物質場域(material domain)，這個物質場域基本上不討論再現或客觀真實的問題，甚至採取極端立場否認客觀真實的存在。從翁秀琪(1998、2001)、翁秀琪與陳慧敏(2000)、倪炎元(2002)到紀

慧君(2002b、2003)，我們可以發現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對於新聞的想像不再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路數，認為媒介真實必須與客觀真實互相對照，媒介真實必須貼近客觀真實。批判取向語言學指出媒介真實才是它們關心的主軸，而媒介真實的意義在於它會建構閱聽眾的主觀真實，而這個真實建構的過程涉及到論述的互相爭霸。

二、批判「論述」負載的權力與制度

有別於結構主義語言學討論的「主體」是一個受制於語言系統的、虛空的主體，批判取向的語言學所認知的「主體」可能是被語言所駕馭的主體，也可能是運用語言做事或抗拒宰制的行動者。而其對於「主體」的思考，在抽象層次上乃是聚焦於「主體形構或建構的過程」以及此一過程中所反映出的權力與制度。以下分別討論影響批判取向語言學中的後結構主義與功能學派對「主體」的說法。

後結構主義者 Foucault(1971/1972)提出了「論述」(discourse)做為分析語言的單位。而由「論述」這個概念衍生出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對批判取向語言學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Foucault 所說的「論述」，其中一個意義是指人是為語言所役，在建構真實的過程中，人已經讓位給語言，論述成為鋪天蓋地型塑真實的主角(鍾蔚文，2004：220)。

Foucault(1971/1972)認為人在世界中受到許多規則管制，這些管制透過不同的陳述(statement)表現出來。論述是陳述的複數，論述背後的秩序限定了哪些可被說(sayable)與可被看見(visible)，所以論述自成一套規則，這套規則叫做論述形構。這個概念首先於 Foucault 的考古學時期提出，在系譜學(genealogy)時期中更加進了「權力」這個點，批判「論述形構」已然成為不可被挑戰的「真理政權」(régime of truth)(Foucault, 1977)。(12) 不過 Foucault 在強調論述的權力效果時，也開啓了對抗權力的契機。在《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中，他明白指出「權力之所在，即抗爭之所在」(Foucault, 1980 / 尚衡譯，1990：82)。這句話除了呼應

他自考古學時期以來一直對於歷史不連續性的強調，並據此推論真理政權並非永恆不變，也進一步暗示論述是意義角逐的戰場，人類也可能成爲抗爭的主體。

相對於 Foucault 對於人類主體性的否定與重新肯定，功能取向的語言學者比較從正面、積極的角度思考主體。他們認爲言語行動與語言系統間存有功能上的聯結關係，而功能即是意義(Halliday, 1994)。因此，分析的焦點放在言語行動上，言語行動取決於人類主體的選擇。此派學者更進一步具體分析語言在特定情境下的功能(Fowler & Kress, 1979; Fairclough, 1992b)。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主體的選擇乃是基於特定歷史情境或條件下才可能產生的行動，所以功能取向的語言學雖然在研究視野上與 Foucault 式的後結構主義有些許差異：即後者比較將焦點置於「說什麼」，而前者則將焦點置於「言者」；但是兩者的交集在於批判「論述」在形構或建構主體時所負載的權力與制度，亦即兩者在對「語言與權力」上的認知上是一致的，也共同關注文本的意識形態軌跡。

落實在新聞批評上，Foucault 式的後結構主義批判新聞文本內容（論述實質與論述形式）中的權力與意識形態，功能學派則批判建構新聞事實過程中，言者的動機與言說位置。另外，後結構主義在實踐上對批判語言學有所啓發。批判語言學者將 Foucault 的權力觀轉化爲實際進行文本分析的架構，從微觀層面檢視言者透過語法(syntax)、字詞傳遞的意識形態以及這樣的意識形態反映出的權力關係。批判語言學並且自我命名爲「文本導向的言說分析」(text-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以有別於 Foucault 重論述形構輕語言文本的主張(Fairclough, 1992a)。功能學派看重人類在語言使用過程中的主體性，並且指陳言語行動是有動機與意圖的，故此派著重主體過度膨脹而來的權力問題。這點使得相關學者同時看重文本巨觀與微觀面的分析，並特別標榜要從巨觀面向詮釋文本中透露出的權力關係，透過語言線索揭露社會體制的「不公不義」，是爲批判言說分析。van Dijk(2003: 352)將批判言說分析定義爲是對社會、政治場域中的文本或語言進行分析，以釐清社會權利的濫用、宰制與不

平等如何藉由論述而鞏固與再生產，又如何藉由論述被抗拒。批判言說分析與批判語言學構成了本文所說的批判取向語言學分析的兩大支柱。⁽¹³⁾

本土實踐中，翁秀琪與倪炎元分別為批判語言學、批判言說分析的代表。翁秀琪的研究側重於關注文本中建構的真實世界、慾望與價值觀（翁秀琪，1998、2001；翁秀琪、陳慧敏，2000）；倪炎元的研究側重於找出透過言語行動傳遞意識形態、進行說服的幕後黑手／主體是誰？研究發現諸如政黨（倪炎元，1996）、父權（倪炎元，2002）、漢人社會、台灣民族主義（倪炎元，1999）…都是共犯結構的成員，透過語言機制鞏固既存體制的權力關係。後來學者也分別依循這兩條具強烈政治意圖與批判意識的進路，對新聞文本中進行分析。

以批判語言學對新聞文本內容進行批判的有蔡篤堅(2000)、紀慧君(2002a)的論文。前者比較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的媒體角色，透過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ies)的方法，對不同政治立場的平面媒體進行批判語言學分析。結果發現：媒體雖然具有主動與積極促進新歷史趨勢或社會權力模式落實的可能，但是在外在人際網絡或社會組織的層層制約下，媒體可能喪失其專業性與行動力，淪為替特定團體利益發聲的管道，間接限制了台灣社會的邁向開放的機會。紀慧君則以 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7 / 劉北成、楊遠嬰譯，2003)一書中提出的「紀律權力」(disciplinary power)為理論基礎，討論新聞教科書提出的知識如何成為一套監視與訓育系統，使得讀者一方面成為自我監控的主體，同時又是被規訓與控制的客體。文中並對於新聞教科書所提供的知識觀恐成為工具理性與當代社會中的真理政權，進行嚴厲的批判。

以批判言說分析對新聞言說者的言說意圖進行批判的有戴育賢(2002)的論文〈從扭曲溝通到獨白論說：婦女運動的報導如何客觀？〉。這篇文章以婦女運動的報導為例，探討媒體在報導政治制度變動下發生的各種社會衝突時，如何客觀地關照到不同發聲位置的觀點。文章雖然以「客觀性」為本，但所謂的客觀並非現代性實證主義的客觀性，而是

一種理論概念，探討透過新聞價值或新聞主觀性篩選後的詮釋論述，是否被扭曲或刻意遮蔽。戴育賢發現新聞生產出的論述是一種獨白的論說，它表面上滿足一般人多樣的論說參與，實則限制參與的視野與能力。所以，新聞本質上是替本地權力集團代言以維繫其統治正當性的工具。

綜觀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其對於主體的思考呈現出一種多元的概念。落實在新聞批評上，則以批判「論述」的權力與制度為主要目的。符合後現代對於現代性「主體哲學」的批判，以及後現代的研究視野。

三、敘事知識：「謬誤推論」的語言遊戲與社會實踐

本土新聞批評史中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對於能指的標榜、對結構主義下能指與所指連結關係的挑戰、以及提出「論述」這個概念作為語言分析的替代性觀點，在在都顯示出現代性下的客觀主義、科學主義、經驗主義已經不再具有正當性的地位，現代性對於「再現真實」的信仰、對於「主體哲學」的思考、對於「大敘事」、「後設敘事」的許可與不加質疑都是後現代極力要去顛覆的對象。這裡，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展現出明顯的後現代性格，拒絕把所有傳統新聞專業義理的后設敘事視為理所當然。在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中，新聞不必然也不一定要客觀，新聞產製過程中也不可能不帶（記者）個人情感，新聞事實的建構甚至還牽涉到讀者主觀認知的因素，因此新聞是否真實？端看你（妳）從哪一個角度出發。在這樣的立場上，與其追問真實如何被忠實地再現，不如正視「新聞」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新聞」的意識形態本質。

Lyotard(1984)對於後現代知識本質的描繪適切地說明批判取向語言學的知識想像。他認為現代性下的大敘事是目的論的、線性的、服膺於進步史觀的權力產物，大敘事成為一種封閉的論述，建立了知識的正當性基礎。在後現代的觀點下，所有的知識（包括科學的知識）都是一種敘事知識(narrative knowledge)(p. 18)，敘事知識透過謬誤推論(parology)將現代性下不被視為「正統」的知識賦予價值(p. 62)。而謬誤

推論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後現代把知識看作是論述，正統的知識也只是論述的一種。而所有的知識在後現代的情境下，都必須透過語言競賽規則建立正當性。所以，我們可以說後現代知識的正當性建立在語言遊戲上，後現代知識的本質是敘事與論述，沒有一套固定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評價知識的品質。

Best & Kellner (1991 / 朱元鴻等譯，1994) 批評 Lyotard 對於知識本質的說法有流於相對主義的問題，終將喪失發展一個批判立場的可能性。Best & Kellner 還主張後現代應該回歸批判現代性的立足點上，才可以有效地建立後現代的政治理論。關於這點批評其實似是而非，恐怕誤解了 Lyotard。本文認為若從對於現代性科學知識的批判來理解 Lyotard，則可以發現他從未放棄批判現代性這個政治手段，所以他並沒有替相對主義背書，而是集中火力在質疑現代性知識的正當性基礎。

以本土新聞批評史中批判取向語言學分析的相關研究為例，所謂的後現代批判或後現代知識並非擁抱一種全然的相對主義。論者在各自的理論詮釋基礎或社會關懷上，借用批判語言學或批判言說分析對於主流的、當道的言說進行拆解，難道不是一種社會實踐？

陸、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對比哲學看待現代與後現代，並且將之轉化為可供分析的理論解釋架構，用以探索本土新聞批評史中語言學分析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研究發現：語言學分析的兩大派別——結構主義語言學與批判取向語言學對於真實、主體與知識正當性上面有相當不同的看法。結構主義語言學比較是現代性的產物，而批判取向語言學則反映出相當的後現代性。林元輝(2004)對於語言學分析的理解雖然關注到其中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流派，並認知到不同的流派對於「新聞」的定義也有所不同，但是缺乏對語言學分析背後的認識論、主體哲學以及知識本質加以分析，導

致漠視語言學分析的複雜性，進而在歸類上出現一些值得商榷之處。

本文認為語言學分析延續了現代性的種種特質，但是其中的批判取向語言學分析卻有往後現代靠攏的傾向。以下先把語言學分析放在本土的新聞批評史脈絡下來理解，思考語言學分析的歷史位置與意義，接著說明本研究的限制並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一、語言學分析的歷史意義

語言學分析在本土新聞批評史中的歷史意義大致有以下兩點。

(一) 修正了實證主義對真實的思考與預設

儘管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新聞透過語言機制所產製的媒介真實必須盡可能地貼近客觀真實，不過，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結構主義語言學雖然預設客觀真實的存在，但是卻修正實證主義對真實的思考，認為只要憑藉科學方法即可以忠實地呈現客觀世界的樣貌。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中，對於客觀真實是否被完整地忠實地呈現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雖然仍然相信那是一個必須去努力的方向。

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則進一步指出有關真實的思考不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而是一個「種類」的問題。當我們把再現真實當作是「程度」的問題，我們會去追問的是：新聞透過語言機制可以再現百分之多少的客觀真實？但是當我們從「種類」的方向思考，則沒有「再現（客觀）真實」的問題，真實是被建構而來的。以後現代的術語來說，「建構真實」意味著能指自成爲一個指意系統，沒有可供對照的實體。能指於是成爲超真實，建構的新聞事實是唯一值得分析與探討的主題。

(二) 承繼批判理論的關懷，開啟後現代的「新聞」概念

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在理論系譜上可以追溯至批判理論的傳統。批判理論對於意識形態與權力問題的關注挹注了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使得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現象時，找到批判的

立足點，不至於淪為相對主義。就這點來說，批判取向語言學分析的後現代批判，乃建立在現代性的理論關懷上。

此外，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還關注到「閱聽眾」，挑戰了傳統新聞學不討論閱聽眾的思考。雖然此刻所說的閱聽眾並沒有被賦予主動性，但是卻對後續研究開始關注閱聽眾的後現代主體（例：林元輝，2004；蔡珮，2003）或理解／認知框架（例：蔡琰、臧國仁，2003）在建構新聞事實中的角色有所啟發。

最後，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指出所謂的「新聞」，其實是多方論述角逐的戰場。決定誰的論述勝出，並非純粹與說服力相關，雄辯不是新聞的本質，新聞的事實版本中充滿了權力運作的痕跡。這個說法暗示了現代性下理性原有的二元對立邏輯徹底被顛覆，因為新聞事實既真且假，新聞事實的成分是當代的(doxastic)、相互主觀的、意識形態的，並非永恆不變的認識論。

二、研究檢討

本文的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大致有幾點。首先，是文本歸類的限制。為了理論討論上的便利，本文將本土新聞批評中的語言學分析分為結構主義語言學與批判取向語言學兩大派別。但是有些研究其實融合了兩大派別的精神，先以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新聞文本進行初步的分析，找出文本中的語言結構，再以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對於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思考為理論解釋架構，對文本進行批判（例如：倪炎元，1999）。這個現象造成了本文在文本歸類上的困難。後來的解決之道是以文章中最主要的問題意識為判斷的依據，本文承認這樣的歸類是相當主觀的。

其次，是理論詮釋的限制。由於本文主要關心的是語言學分析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因此在對個別語言學派別進行詮釋時必須做出相當大的取捨，無法在有限的篇幅與研究焦點的考量上窮盡每個語言學派的理論精隨，這幾乎是本文難以避免的問題。

再者，是理論框架的限制。本文在研究動機、目的與理論偏好之基

礎上，主要援引沈清松(1993)對於現代與後現代的討論，並將其轉化為可供實際分析的類目。但本文也充分意識到採取此一理論框架的可能問題。例如蔡錚雲(2001: 221, 223-224)就認為沈清松只是在討論「平實現代性」對「崇高現代性」的指責，蔡錚雲並且主張以靜待其變的方式讓後現代自行解構，才是認識後現代最恰當的方式。所以，若改採不同的觀點定義現代與後現代，並據此建構本土新聞批評的歷史圖像，思考語言學分析的歷史意義，應該會有不同的風貌。

最後，是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西方語言學轉向之後，其實面臨了好幾波的轉折，每一次轉折都牽涉到對人、對社會、對真實的不同思考。西方語言學的理论開展本身即是一個值得建構的批評史。未來相關研究亦可對比本土與西方新聞批評史中語言學分析的演進與趨勢，瞭解不同文化下的知識產製，或許另有一番價值。比方說西方的語言學分析在時間點上先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後來出現的批判取向語言學分析則是在結構主義的理論基礎上，對其認識論加以批判，並發展出替代性的分析取徑；但在本土新聞批評史中，結構主義語言學與批判取向語言學卻幾乎是同時出現。造成此種差異的原因，值得思考。

另外，從本文的分析結果來看，可以初步發現國內學者在因應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些西方思潮趨勢的同時，試圖藉由本地的經驗資料與西方既有的概念對話（例如：翁秀琪(1998)所初步發展出的「在地權力觀」），逐步建構本土的新聞批評史。這其中的重要意義，有待後續研究探索。

註釋

- (1) 「新聞批評史」，是指學術社群對於「新聞」此一概念的研究歷程。其中的「批評」二字，則是強調相關研究雖然有不同的世界觀或研究路數，但在某個面向上，均可視為對「新聞」的本質與內涵進行反省。而本文旨在探討本土新聞批評史中語言學分析的歷史位置，所以，將討論的重心放在國內學術界對此一議題的關注上。下一段將先簡介本土新聞批評的歷史流變，作為後續論述與詮釋的基礎。
- (2) 本文所說的「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包括批判言說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與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兩種，在本文「伍、新聞是論述：語言學分析的後現代性」的第二部份會加以討論與比較。
- (3) 本文主張從這兩個層次進行分析是受到 Bourdieu(1977)的啟發。Bourdieu 將知識的探索描述為一個外邊人(outsider)進入一個陌生的國度，必須仰賴地圖才能夠瞭解這個世界。而在研究者意圖再現世界以建構知識時，必須同時具有兩個斷裂(break)，第一個斷裂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斷裂，第二個斷裂是研究者與自己的斷裂。Bourdieu 認為如此才能夠從後設的角度認知到自己的批評或研究位置，也才能夠比較客觀地再現世界。本文在研究目的的考量上，將 Bourdieu 的兩個斷裂加以轉化，第一個斷裂的目的在找出相關研究對於「新聞」的思考，第二個斷裂目的在釐清相關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論立場。
- (4) 本文不同意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正如同國內學者蔡錚雲(2001)指陳，將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在時序上作出先後排比，經常落入以現代的文化特質或預設來看待後現代的泛道德化困境，如此無助於相關概念的釐清，也缺乏正當性。此外，在美學風格上，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也時常出現在同一個藝術作品上（沈清松，1993）。因此，本文傾向從後現代對於現代的批判與超越為切

點，探討兩者的文化意義，此舉是基於理論討論的目的。

- (5) 關於人既是客體又是主體，還可以參考 Foucault 系譜學時期的兩本著作：《規訓與懲罰》（1977 / 劉北成、楊遠嬰譯，2003）和《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1980 / 尚衡譯，1990）。前者主要討論人如何被紀律社會中的權力機制規訓成為客體，後者則以基督教對於性的壓抑為例，指陳人如何藉由「告白」被不著痕跡的真理與權力機制打造成為主體。而 Foucault 晚期的著作，亦即性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Foucault, 1984/1990）、第三卷《關注自我》（Foucault, 1984/1988）的書寫，則將研究焦點向倫理學轉向，藉由探討自我如何關照自我以成為倫理主體與道德行動者，思考人如何透過自我修養的過程追求自由。
- (6) 女性主義學者 Jenson(1985)從政治論述(political discourse)來談封閉的論述，指出政治論述的封閉性決定了意義的生產與正當性。哪些議題被認為是政治的，哪些議題被認為是非政治的、私人的、不重要的，都受到政治論述的封閉性所限定。Jenson 從女性主義立場批判父權（包括國家）和後現代對於現代性主體哲學的批判雖然豎立了不同的稻草人，但是發展出的論述卻十分雷同。
- (7) 林元輝(2004：71)以「寫真」比喻現代主義對「再現真實」的極端信念，以「逼真」比喻新實證主義在「再現真實」上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這兩個比喻有助於我們瞭解現代性對於「再現真實」的不同思考與轉變。
- (8) Rorty(1985)曾經批評 Lyotard 的大敘事已死的說法恐怕有建構另一個「大敘事」的可能，因為當 Lyotard 批判 Habermas 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背後的正當性基礎時，大敘事已死的說法同時將自身給合法化。Rorty 因此認為 Lyotard 的反大敘事立場將使得他面臨理論體系內在不一致的困境。
- (9) 此處將語言學(linguistics)與符號學(semiology)兩者搭配使用，未清楚加以劃分，主要是因為 Saussure(1972/2002)指出語言學是符號學

這全面性科學中的一門，符號學的定律可以全面運用於語言學之上，所以本文認為兩者應共享特定的理論基礎。

- (10)前面曾經提到 Saussure 認為意義來自於能指與所指任意武斷的聯結關係，而此聯結關係很難更動，也是另一個途徑去理解 Saussure 的符號學理論如何思考人類主體性。
- (11)Best & Kellner (1991 / 朱元鴻譯，1994) 認為後結構是後現代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對現代性下「再現真實」的批判，後結構與後現代幾乎一致。他們因此指出「後結構應該被詮釋成塑造後現代論述的理論趨勢、文化趨勢與社會趨勢的一部分」(p. 46)。本文認為這個說法恰好足以證陳(argue)批判取向語言學的後現代性。
- (12)Fairclough(1992a)將 Foucault 的知識體系分為考古學、系譜學與倫理學三個時期，其中前兩個時期對於批判取向的言說分析較有影響。而考古學與系譜學的差異在於後者在考古學發現陳述在某時、某地中成為可能且排除其他陳述之後，帶入「權力」來作為詮釋的切點。
- (13)本文此處對於批判語言學和批判言說分析的區分與歸類必須進一步說明。在區分上面，兩者其實並沒有那麼清楚地切割，本文將兩者做出區分只是為了討論與理解上的便利。在歸類上面，本文認為批判語言學受到後結構主義的影響較深，批判言說分析則可歸類為功能學派的理論系譜，這與倪炎元(2001)的說法不同。倪炎元以批判語言學者自承受到 Halliday 的影響為證據，認為批判語言學應該是在功能學派的系譜下，這種說法其實有待商榷。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批判語言學的相關文獻，不難發現此派學者雖然肯定語言的「功能」，但是強調語言的功能受到了論述形構的限制。也正因為這點認知，使得批判語言學在對文本中的意識形態進行檢視時找到立足點。批判言說分析則是西方語言學近期發展出的路數，此派學者在相關文獻中毫不掩飾從言語行動分析語言功能的主張，因此與功能學派的說法似乎比較貼近。

參考書目

- 王晴佳、古偉瀛 (2000)。《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
- 朱元鴻、馬彥彬、方孝鼎、張崇熙、李世明譯(1994)。《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台北：巨流。(原書 Best, S., & Kellner, D. [1991].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 江政寬譯 (2000)。《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遜與懷特》。台北：麥田。(原書 Jenkins, K. [1995].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何東洪、張釗維 (2000)。〈戰後台灣「國語唱片工業」與音樂文化的發展軌跡：一個徵兆性的考察〉，《台灣產業研究》，3：149-224。
- 沈清松 (2000)。〈有關宗教理論與宗教教育的三個哲學問題〉，《輔仁宗教研究》，1：3-24。
- (1993)。〈從現代到後現代〉，《哲學雜誌》，4：4-25。
- 林元輝 (2004)。〈本土學術史的「新聞」概念流變〉，翁秀琪 (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頁 55-84。台北：巨流。
- 林芳玫 (1995)。〈師大強暴「疑」案報紙報導之分析：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新聞學研究》，51：33-55。
- 林麗雲 (2002)。〈依附下的成長？台灣傳播研究典範的更迭興替〉，《中華傳播學刊》，1：103-137。
- (2000a)。〈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傳播文化》，8：117-211。
- (2000b)。〈台灣威權體制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台灣產業研究》，3：89-148。
- 尚衡譯 (1990)。《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80]. *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 洪凌譯 (1998)。《擬仿物與擬象》。台北：時報。(原書 Baudrillard, J. [1981].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Editions Galilée.)
- 胡紹嘉 (1999)。〈如果身體會說…：醫療報導語言中的人與身體〉，《新聞學研究》，61：1-30。
- 紀慧君 (2003)。〈定位的政治：主體與權力研究的再思考〉，《中華傳播

學刊》，3：83-127。

----- (2002a)。〈編織新聞事實：紀律權力的觀點〉，《新聞學研究》，73：167-204。

----- (2002b)。《是真與擬真之間：新聞語言的互文性網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0-2412-H-032-004)。台北：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 (2000)。〈新聞教科書中的「事實語言」〉，林靜伶(編)，《1999 傳播論文選集》，頁 111-150。台北：中華傳播學會。

倪炎元 (2002)。〈台灣女性政治精英的媒體再現〉，《新聞學研究》，70：17-58。

----- (2001)。〈初探論述分析與傳播研究：兼論其在中文傳播研究上的前景〉，郭良文(編)，《2000 傳播論文選集》，頁 127-167。台北：中華傳播學會。

----- (1999)。〈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58：85-111。

----- (1996)。〈主流與非主流：報紙對一九九〇年國民黨黨內政爭報導與評論的論述分析〉，《新聞學研究》，53：143-159。

翁秀琪 (2001)。〈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新聞學研究》，68：117-149。

----- (1998)。〈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新聞學研究》，57：91-126。

----- (1994)。〈我國婦女運動的媒介真實和「社會真實」〉，《新聞學研究》，48：193-236。

翁秀琪、陳慧敏 (2000)。《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

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 (1999)。〈似假還真的新聞文本世界：新聞如何呈現超經驗事件〉，《新聞學研究》，58：59-83。

高宣揚 (1999)。《後現代論》。台北：五南。

陳百齡 (2001)。〈從國科會傳播專題計劃提案看學門發展生態：1966-2000 年〉，《新聞學研究》，67：25-50。

- 程宗明 (2000)。〈台灣電訊傳播制度的「主體性格」分析：電信事業獨佔表現與資費制度的關聯性研究(1950-1970)〉，《傳播文化》，8：253-284。
- (1999)。〈析論台灣傳播學研究 / 實務的生產(1949-1980)與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林靜伶 (編)，《1999 傳播論文選集》，頁 385-439。台北：中華傳播學會。
- 馮建三 (1995)。〈科技新聞是意識形態嗎？：探討科技記者與科技專家的關係兼論另類科技新聞的可能空間〉，《新聞學研究》，50：41-60。
- 賈士衛譯 (1996)。《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原書 Jenkins, K. [1991].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蔡珮 (2003)。〈後現代的新聞書寫：「個人新聞台」，「全球化時代與新聞報導研討會」論文。台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 蔡琰、臧國仁 (2003)。〈由災難報導檢討新聞美學的「感性認識」：兼談新聞研究向美學轉向的幾個想法〉，《新聞學研究》，74：95-119。
- 蔡瑞霖 (1997)。〈虛擬的真實：「揭諦」及其相應於對比哲學的真理觀〉，《揭諦》，1：19-78。
- 蔡錚雲 (2001)。《從現象學到後現代》。台北：五南。
- 蔡篤堅 (2000)。〈轉向規訓社會中的媒體角色：以解嚴前後醫療報導為主軸的分析詮釋〉，《新聞學研究》，63：55-89。
- 劉北成、楊遠嬰譯 (2003)。《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Allen Lane.)
- 劉慧雯 (2002)。〈Saussure 符號學理論在廣告研究中的應用：文本意義研究的更弦易幟〉，《新聞學研究》，70：197-227。
- (2001)。〈「現代」之謎：從建構新聞批評史看現代性在台灣傳播學界留下的印跡〉，「國立政治大學九十學年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台北：政治大學。
- 臧國仁、鍾蔚文 (1999)。〈時間概念與新聞報導：新聞文本使用時間性語彙之探析〉，《新聞學研究》，61：137-178。
- 戴育賢 (2002)。〈從扭曲溝通到獨白論說：婦女運動的報導如何客觀？〉，《中華傳播學刊》，1：139-185。

- (1994)。〈大眾媒體與真實建構——一次現象社會學的探討〉，《新聞學研究》，48：169-192。
- 鍾蔚文 (2004)。〈想像語言：從 Saussure 到台灣經驗〉，翁秀琪 (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頁 199-264。台北：巨流。
- 鍾蔚文、翁秀琪、紀慧君、簡妙如 (1999)。〈新聞事實的邏輯〉，《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4)：575-589。
- Adoni, H., & Mane, S.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323-340.
- Baudrillard, J. (2000). Beyond use value. In M. Lee (Ed.), *The consumer society reader* (pp. 19-30). London: Blackwell.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97).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67).
- (1973).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2a).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 (1992b). Discourse and text: Linguistic and intertextual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3*, 193-217.
- Fishman, D. B. (1999). *The case for pragmatic psychology*.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94).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 (1990). *The use of pleasure, volume 2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R.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84).
- (1988). *The care of the self, volume 3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R.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84).

- (1977).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D. F. Bouchard & S. Simon (Eds.),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pp. 139-164).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f language* (A. M. S. Smith,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1).
- Fowler, R., & Kress, G. (1979).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 Fowler, B. Hodge, G. Kress & T. Trew (Eds.), *Language and control* (pp. 185-213). London, Bost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of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rvey, D.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 418-434.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Jenson, J. (1985). Struggling for identity: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8, 5-18.
- Lyotard, J. F. (1993).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Quail, D. (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 London: Sage.
- Ritzer, G., & Goodman, D. (2001).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In J. H. Turn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pp. 151-169). New

-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 Rorty, R. (1985). Haberm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rnity. In R.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pp. 161-176). Cambridge, UK: Polity.
- Saussure, F. de (2002).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 Harris, Trans.). Chicago &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2).
- Toulmin, S. (1990). *Cosmopolis*. New York: Free.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 van Dijk, T. A. (200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E.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pp. 357-371). Oxford: Blackwell.



智慧藏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News”:
The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of Linguistic Studies in Taiwan’s
Journalism History**

Hsiao-Yung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nguistic studies in Taiwan’s Journalism history by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news”. Starting with a critique of Lin’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ttribution,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oversight of complexity of linguistic studies. Drawing on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two typ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are specified: structuralism-oriented approach vs. critically oriented approach (post structural and systemic-functional). The former can be attributed to modernism; the latter unfolds postmodernity in respect of 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epistemology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at linguistic studies not only challenge the assumptions of positivism but inherit the emancipatory interest of critical theory and inspire the postmodern thinking to treat news as “discourse”.

Keywords: critically oriented linguistics, postmodernity, modernity,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journalism history

* Hsiao-Yung Wang is a Ph. D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